

隋唐

军事征伐礼仪

李蓉著



国防工业出版社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Press

隋唐军事征伐礼仪

李蓉 著

国防工业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大唐开元礼》之“军礼”十卷为基本框架,广泛收集唐礼、唐律、唐令、唐典、兵书、诏敕公文、墓志、唐人文集等文献中有关“军礼”的内容,按战争全过程将隋唐军事征伐礼仪分为“出师前礼仪”、“出征礼仪”、“征战礼仪”、“凯旋庆功礼仪”、“丧葬吊恤礼仪”等五大部分。对其中涉及的类天、宜社、告庙(兼告齐太公庙)、鞍祭、命将、劳遣、誓师、祭牙纛、祭告所过山川、禡祭、遣使劳军将、宣露布、奏凯、献俘、饮至、策勋、阵亡吊恤礼仪等17类礼仪逐一分析整理,并对其中诸多细节进行考证和补充,尽最大可能恢复隋唐军事征伐礼仪之面貌。同时,还在探讨隋唐兵制、官制的发展演变对军事征伐礼仪的影响基础上,努力探究其礼其仪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以及具有的社会功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隋唐军事征伐礼仪/李蓉著.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118-10227-7

I. ①隋... II. ①李... III. ①军事—礼仪—研究—
中国—隋唐时代 IV. ①E2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9751号

※

国防工业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23号 邮政编码100048)

涿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3½ 字数 302千字

2015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定价4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国防书店:(010)88540777

发行邮购:(010)88540776

发行传真:(010)88540755

发行业务:(010)88540717

中国素称“礼义之邦”，在传统社会群体生活的各个环节，礼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由于礼仪具有敬神明、别尊卑、合亲众的本质特点，因此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在军事活动中强调礼仪规范的重要性，正所谓“礼信，战之器也。又曰：治军，非礼威严不行。是知军旅有礼，则武功克成，然后敦阵有果毅之容，御众有长幼之序，知其可用，能以德攻者也。”^①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吴起也指出：“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②因此，在西周开始形成的“五礼”（吉、凶、军、宾、嘉）系统中，第三大类礼仪即“军礼”。中国古代的“军礼”也叫“兵礼”，它是一个含义宽泛的概念，更是一个庞杂的礼法系统，既包括军事行动和准军事行动中的各类礼仪，也包括军事行动中的一些规章制度、纪律法规，其影响范围涵盖军事行动和军队自身建设的全过程。可以说，从出征、交战到回师，从阅兵、军演到特殊节令都有军礼的身影。

由于军事活动的特殊性，“三代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仪礼》：吉、凶、宾、嘉，达于天下，而军礼独载于大司马法。若国有师田之事，则县师始受法于司马，以作民。”^③故军礼在五礼中的地位非常特殊，其他四礼均由大宗伯^④主责，而军礼则单独由大司马^⑤主管。平时只适用于军旅，只有在发生战事，全民皆兵时，才适用于天下。

春秋后以至秦代，尽管战争更加频繁，但在“礼崩乐坏”的大背景下，周代军礼日益衰落，一些传统的征战礼仪被背弃，战争也由西周征服不驯的“义战”逐渐演变为唯利至上的“诡道”^⑥。著名的泓之战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宋襄公因拘泥旧礼，不肯违背传统的交战原则，结果不仅一败涂地，还成为千百年来被后人嘲笑的对象。

“汉兴，叔孙通草定，止习朝仪。至于郊天祀地之文，配祖禋宗之制，拊石鸣球之备物，介丘璧水之盛猷，语则有之，未遑措思。及世宗礼重儒术，屡访贤良，河间博洽古文，大搜经籍，有周旧典，始得《周官》五篇，《士礼》十七篇。”^⑦此时，周代军礼中的大均、大役、

①（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388《将帅部·有礼》，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74页。

②（战国）吴起：《吴子兵法·图国第一》，引自《中国兵书集成》（第1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沈阳：辽沈书社，1990年，第37-38页。

③（宋）陈傅良：《历代兵制》卷2，引自《中国兵书集成》（第7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沈阳：辽沈书社，1992年，第253页。

④据《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其职责相当于后世的礼部尚书。

⑤据《周礼·夏官·大司马》记载：“大司马之职，掌建邦国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国。……以九伐之法正邦国。”

⑥据《册府元龟》卷420《将帅部·掩袭》记载：“古之用人也，谋于庙，宜于社，推毂以命将，秉旄而誓众，鸣鼓以启行，克日以告战，是谓节制之师，仁义之举也。及乎狙诈云盛，智巧相图，故老氏言乎用奇，孙子谓之诡道，乃有人衔枚，马缠勒，夜行昼伏，掩其不备之事兴焉。”

⑦（后晋）刘昫：《旧唐书》卷21《礼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16页。

大封之礼早已不复存在,但誓师、献俘、受降、行赏等仪仍然得以不同程度地留存下来。因此,秦汉以后的军礼,主要是指在军事活动、准军事活动,特殊节令中需要遵行的各种礼仪规范,包括命将、誓师、受降、献俘、行赏、田猎、大阅、大射以及救日伐鼓、雩祭驱邪,等等。

“古代军礼再度受到重视,并有所复兴,始自魏晋。”^①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频仍,各国皇帝经常亲率大军出征,因而希望系统恢复周代军礼的呼声日益高涨。为此,北魏、北齐、北周、南梁等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均做了许多努力与尝试,最终与征伐有关的古代军礼在形式上基本得到复原,并被载入国家礼典,成为隋唐两代遵用的范本。但是有鉴于当时南北方的文化差异与政治对立,对礼的解读存在争议,故各朝礼制之间存在诸多矛盾抵触之处。

因此,隋王朝完成统一之后,最先着手的大事之一就是修定统一的国家礼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举措的意义实不亚于当年始皇帝之车同轨、书同文。虽然是北朝政权的继承者,但作为统一王朝,隋对南北文化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以北齐礼仪为基准,兼采魏、晋、南朝礼仪的部分内容,对南北朝以来混乱的礼制进行整理,进而制订了更加符合时代需要的隋代礼制。可以说,隋代礼制是汉魏以来中国古代礼制的集大成之作,因此,唐朝建立之初在礼制上“郊庙宴享,悉用隋代旧仪”。^②

唐太宗即位伊始,即着手在隋礼的基础上修订唐礼。史载:“至太宗时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与礼官学士等,因隋之礼,增以天子上陵朝庙、养老、大射讲武、读时令、纳皇后、太子入学、太常行陵、合朔、陈兵太社等,为《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十一篇,是为《大唐贞观礼》。”^③

可见,《大唐贞观礼》是以隋礼为基础,并结合实际需要新增了部分礼仪,其中如“大射讲武”、“合朔”、“陈兵太社”等都属于军礼的内容。从《大唐贞观礼》有《军礼》二十篇来看,很显然,隋唐军礼在南北朝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一个相对独立而系统完整的礼仪体系,具有梳理和研究的可能与价值。

随着唐的强盛和时代演进,礼制的更新与改良问题不断被提出,于是唐高宗又诏太尉长孙无忌等增之为一百三十卷,是为《大唐显庆礼》。玄宗开元十四年(726),通事舍人王岩上疏请删去礼记旧文,而益以今事,诏付集贤院议。学士张说以为“唐贞观、显庆礼,仪注前后不同,宜加折衷,以为唐礼。乃诏集贤院学士右散骑常侍徐坚、左拾遗李锐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历年未就而锐卒,萧嵩代锐为学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一百五十卷,是为大唐开元礼。”^④开元二十年(732)九月,《大唐开元礼》开始正式颁布使用。

正所谓盛世修盛典,一部《大唐开元礼》结束了魏晋以来礼制领域的纷争局面,更标志着唐礼的真正形成。史称:“由是,唐之五礼之文始备,而后世用之,虽时小有损益,不能过也。”^⑤所以,有学者指出,“《大唐开元礼》是汉魏以来五礼的规范和总结,是礼的一

① 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24页。

② 《旧唐书》卷21《礼仪一》,第816页。

③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1《礼乐一》,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98页。

④ 《新唐书》卷11《礼乐一》,第198页。

⑤ 《新唐书》卷11《礼乐一》,第198页。

般性原则规定,在唐代受到礼经一样的尊崇,……尽管《大唐开元礼》中一些礼仪如“养老礼”在唐代并未推行,但它的基本原则和规定在唐代中后期是得到遵循的,而且对当时的国家礼仪生活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讲,《大唐开元礼》在唐代是基本得到行用的。”^①

《大唐开元礼》中有关“军礼”的内容只有十卷,与《大唐贞观礼》相比,其篇幅并不很大,但内容却稍嫌庞杂。据《唐六典》记载,唐代:“凡五礼之仪一百五十有二”,其中“三曰军礼,其仪二十有三。(一曰亲征类于上帝,二曰宜于太社,三曰告于太庙,四曰禡于所征之地,五曰輶于国门,六曰告所过山川,七曰露布,八曰劳军将,九曰讲武,十曰田狩,十一曰射于射宫,十二曰观射于射宫,十三曰遣将出征宜于太社,十四曰遣将告于太公庙,十五曰遣将告于太庙,十六曰祀马祖,十七曰享先牧,十八曰祭马社,十九曰祭马步,二十曰合朔伐鼓,二十一日合朔诸州伐鼓,二十二曰大雉,二十三曰诸州、县雉。)”^②这里提及唐代军礼共有23种,其数量占“五礼”总数的15%。这些军礼既有对汉魏、北朝军礼的吸收继承,也有隋唐两朝自己的改良创新。除此之外,在唐律、唐令、唐典、兵书和诏敕中也保存着一些隋唐军礼的内容,可以视作是对《大唐开元礼》的补充。

根据其内容与适用范围,笔者将23种唐代军礼大致划分为征伐礼仪、校阅礼仪、田猎礼仪、射礼、雉礼、合朔伐鼓等六大类。本书主要对其中内容最多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征伐礼仪作深入梳理与研究。为此,本书拟以唐宋变革论为主要理论,以对中古礼仪整体趋势的把握为主要视角,以《大唐开元礼》之“军礼”十卷为基本框架,结合唐律、唐令、唐典等内容,按战争的全过程将与隋唐军事征伐有关的军礼分为“出师前礼仪”、“出征礼仪”、“征战礼仪”、“凯旋庆功礼仪”、“丧葬吊恤礼仪”等五大部分,逐一分析整理,以尽可能恢复隋唐军礼中有关征伐礼仪的面貌,并探究其主要内容与文化内涵、社会功能等。

为了丰富隋唐军礼的礼仪细节,本书在时间选择上没有把时段局限在隋唐,而是上溯汉代,下涉宋明,尽可能探寻隋唐军事征伐礼仪的来龙去脉。在内容选择上,将礼制史与社会史、军事史研究相结合,对各种礼仪的诸多细节仔细考证说明,探讨隋唐兵制、官制的发展演变对军事征伐礼仪的影响,以对隋唐军事史、礼制史作研究方面之补充。

^① 刘安志:《关于〈大唐开元礼〉的性质及行用问题》,《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95-117页。

^② (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卷4《尚书礼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11页。

综述	1
引言	5
第一章 出师前礼仪	9
第一节 军事祭祀礼仪	9
一、类天礼	12
(一)卜日	12
(二)陈设	13
(三)斋戒	16
(四)纂严	18
(五)銮驾出宫	20
(六)荐玉帛	21
(七)进熟	23
(八)銮驾还宫	24
二、宜社礼	26
(一)皇帝亲征宜于太社	28
(二)制遣大将出征有司宜于太社	32
三、告庙礼	35
(一)皇帝亲征告于太庙	35
(二)制遣大将出征有司告于太庙	40
(三)制遣大将出征有司告于齐太公庙	42
四、輶祭	48
(一)輶祭的由来	48
(二)隋唐輶祭的基本情况	49
第二节 命将礼	51
一、唐以前命将礼之源变	52
二、唐代命将礼的内容	55
(一)授斧钺	55
(二)授旌节	59
第二章 出师礼仪	67
第一节 劳遣	67
一、劳遣与军事劳遣	67

二、隋唐劳遣的地点选择	70
(一) 隋代至初唐时期	70
(二) 高武至盛唐时期	70
(三) 中唐至唐末时期	73
三、隋唐劳遣的仪式构成	75
第二节 誓师	77
一、誓师的仪式构成	78
二、誓文的主要内容	80
第三节 祭牙纛	82
一、何为“牙”、“纛”	83
二、祭牙纛的由来	85
三、隋唐祭牙纛之制	87
(一) 牙纛之制	87
(二) 祭牙纛之仪	89
第三章 征战礼仪	94
第一节 祭告所过山川	94
一、皇帝亲征及巡狩告所过山川	95
(一) 祭品选用	96
(二) 告官就祭	96
(三) 仪式过程	97
二、大将出征祭告所过山川	98
第二节 禡于所征之地	100
一、隋唐前之禡祭流变	100
(一) 先秦禡祭探源	100
(二) 汉魏北朝之禡祭	101
二、隋唐禡祭的基本情况	103
(一) 隋代禡祭	103
(二) 唐《开元礼》之“皇帝亲征禡于所征之地”	105
(三) 唐代禡祭的演变	107
第三节 遣使劳军将	108
一、安史之乱前的遣使劳军将礼	109
(一) 关于使臣的选择	110
(二) 劳军的目的和仪式	111
二、安史之乱后的遣使劳军将	114
(一) 从劳军到宣慰——目的多元化	116
(二) 宣慰使职的出现	118
(三) 沉重的赏赐负担	120
第四章 凯旋庆功礼仪	122
第一节 宣露布	122

一、“露布”的由来	122
(一) 讨檄之文	123
(二) 献捷之书	124
二、唐代宣露布之仪	127
(一) 宣露布之仪	128
(二) 撰写露布的要求	129
第二节 告功献俘	131
一、入城奏凯	132
(一) 隋唐凯乐的由来	132
(二) 隋唐凯乐之演变	133
(三) 隋唐奏凯仪式	137
二、告祭献俘	138
(一) 隋文帝至唐太宗时期	142
(二) 唐高宗时期	143
(三) 唐玄宗朝之后时期	145
第三节 饮至策勋	147
一、天子与饮至礼	149
二、宴饮与饮食	150
(一) 赐宴	150
(二) 宴饮乐舞	152
(三) 宴会饮食	155
三、策勋与赏赐	157
(一) 策勋	158
(二) 赏赐	166
第五章 丧葬吊恤礼仪	171
第一节 递送回乡	171
一、对士卒遗体的递送	171
二、对将领遗体的递送	175
(一) 阵亡	175
(二) 从行	177
(三) 戍守	178
第二节 就地殡葬	179
一、士卒的就地殡葬	179
(一) 由军队负责收葬	180
(二) 由战地附近州县负责	181
二、将领的就地殡葬	182
结语	184
附录	187
参考文献	201

综 述

中国素称“礼义之邦”，在传统社会群体生活的各个环节，礼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因此，早在西周，我国就形成了以吉、凶、军、宾、嘉为主体的“五礼”系统。此后，礼学一直是中国旧学的大宗，尤其在清代考据学兴盛的大背景下，礼学研究更是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自十九世纪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社会转型，旧学随之逐渐解体。更由于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反帝制与反儒学是革命的两大主题，因此中国传统礼仪文化一直被视为封建残余而受到猛烈批判和攻击，由此，直接导致对礼仪文化的研究长期停滞不前。

二战前后，日本的一些著名学者如服部宇之吉、宇野精一、武内义雄等，开始通过研究儒学展开对礼制的研究，但其关注点多为礼如何作为一种时代与国民的精神，其研究则为礼的起源，时代下至汉代，罕及唐礼。这一时期，在国内，1935年，陶希圣所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第四册》由新生命书局正式出版，该书从政治思想史研究出发，提出由于儒家的礼与律被隋唐订为国家法典，故传统的隋唐时期“儒学衰微”的说法是不准确的。1943年，隋唐史研究大家陈寅恪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制是其正文的第一章。由于该书是对制度渊源进行探讨，故陈寅恪主要运用研究政治史的办法，对参与制礼的士大夫身世、活动进行研究，较少涉及隋唐礼制本身。最后指出，隋代虽然继承了西魏北周的政治衣钵，但论其礼制渊源，还是主要来自梁陈礼制和融入了汉魏礼制的东魏北齐礼制，而唐礼则主要是在隋礼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此后，由于时代原因，不光隋唐礼制的研究出现了空白，而且整个礼制史研究都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现象。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中国古代礼制的研究开始起步。在国外，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和他的研究会对此贡献巨大。西嶋定生主要研究秦汉史，他的关注点在于通过对比皇帝制与天皇制的差异来探讨中日国体的差异。作为皇帝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郊祀、太庙、即位等礼仪开始受到关注。在他的学生中金子修一则主要研究隋唐礼制，尤其是对唐代的祭祀制度着力颇多，其所著的《唐代の大祀・中祀・小祀について》^①和《魏晋より隋唐に至る郊祀・宗廟の制度について》^②等文对唐代郊祀和宗庙祭祀制度作了充分研究和说明。在国内，同时期对礼制的研究则比较冷清，值得一提的是196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杨宽所著《古史新探》一书。在该书的最后一部分，杨宽集中对先秦的“籍礼”、“冠礼”、“大蒐礼”、“乡饮酒礼”与“飨礼”、“射礼”、“贄见礼”等古礼探本溯源。尤其对“大

① 金子修一：《唐代の大祀・中祀・小祀について》，《高知大学学术研究报告·人文科学编》1976年，第25页。

② 金子修一：《魏晋より隋唐に至る郊祀・宗廟の制度について》，《史学杂志》1979年第88编第10号。

蒐礼”和“射礼”的研究更是国内较早对先秦军礼的研究之一。但可惜的是由于其研究方向在先秦史,故对唐礼基本没有提及。可以说,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以唐礼为专题之研究在中国大陆几乎没有着手进行。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国内学者开始逐渐兴起对古代礼制的研究,但遗憾的是其关注点仍然放在先秦礼仪,而没有放在隋唐礼仪上。而同时期的美国学者魏侯玮和英国学者麦大维(David L. McMullen)则致力于唐代礼制研究,并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1985年,魏侯玮出版的专著《玉帛之奠:唐代合法化过程中的礼仪和象征性》,对唐前期即位、郊祀、宗庙、先代帝王、巡狩、封禅、明堂等重要礼制的历史源流和现实功能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即唐前期是中国帝制时代礼制演变的一个分水岭。而麦大维则在其《唐代的国家与学者》一书中,通过唐人有关郊祀、太庙、明堂、封禅等礼仪之争论,对唐代礼制由《大唐贞观礼》到《大唐显庆礼》,再到《大唐开元礼》的变化轨迹进行梳理和研究,对后来国内学者研究唐礼多有启发和帮助。

事实上,国内学者对唐礼的关注始于对唐律的研究。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由于国内法制建设的现实需要,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注意到唐律的研究价值,唐律研究呈现蓬勃之势,成果显著。但由于从汉代开始,国家官僚们就把儒学精神、礼制原则,以及礼的规范直接融入法律之中,这种引礼入法的过程至唐代得以完成,一部《唐律疏议》就是这一过程完成的标志。此后,到中国最后一部封建法典《大清律例》都贯穿着儒家所强调的礼法原则,因此,要研究唐律,势必不能回避对唐礼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刘俊文《唐律与礼的关系试析》^①、《唐律与礼的密切关系例述》^②、王立民《唐律的礼法关系透视》^③都是开先河之作。此后,将唐礼研究与唐律、乃至唐令研究^④相结合,遂成为唐礼研究中的一大领域。

但由于当时对唐律的研究是主流,因此学者多注意礼法互动之影响,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国内才出现了以唐礼为专题的历史学研究。其中雷庆、郑显文《贞观时期的礼制改革》^⑤探讨了贞观时期关于讳礼、婚礼、尊亲礼等的改革。郑显文《唐代礼学的社会变革》^⑥则进一步指出唐代礼学有由贵族礼学向庶民礼学,由仪注化礼学向日用化礼学的演变趋势。赵澜《〈大唐开元礼〉初探——论唐代礼制的演化历程》^⑦则通过梳理《大唐贞观礼》、《大唐显庆礼》至《大唐开元礼》的修礼过程,对《大唐开元礼》进行研究。这类研究多将礼制视为统治者加强政治统治的权力工具,认为是为了适应不同的社会现实,加强统治才促使礼制的不断革新。

但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开始打破礼制研究时的这一固有思维模式,注意到礼的文化内涵,于是有了新的研究点。如胡戟的《中国古代礼仪》(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中国文化通志·礼仪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等,尤其是后者分“礼仪的源起”、“礼仪

① 刘俊文:《唐律与礼的关系试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5期,第10-21页。

② 刘俊文:《唐律与礼的密切关系例述》,《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5期,第70-78页。

③ 王立民:《唐律的礼法关系透视》,《儒学与法律文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④ 李玉生:《唐令与礼关系析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40-47页。

⑤ 雷庆、郑显文:《贞观时期的礼制改革》,《松江学刊(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第44-48页。

⑥ 郑显文:《唐代礼学的社会变革》,《人文杂志》1995年第2期,第79-83页。

⑦ 赵澜:《大唐开元礼初探——论唐代礼制的演化历程》,《复旦学报》1994年第5期,第87-92页。

的沿革”、“五礼分叙”三部分,对官颁五礼中六十种主要礼仪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归纳。其中第十七章《军礼——同邦国耀武征服不驯的征伐之礼》分“征伐之礼”、“校阅之礼”、“田猎之礼”、“巡狩之礼”和“救日之礼”五部分对军礼进行了梳理,是国内较早较系统的军礼专门研究成果之一。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研究唐代礼制的综合性专著,比如陈戍国的《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和任爽的《唐代礼制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其中《中国礼制史》(六卷本)对从先秦至明清的中国礼制进行了认真梳理,是难得一见的礼制通史著作。而任爽的《唐代礼制研究》则在认真梳理唐代礼制的基本内容及其演变的基础上,进而探讨了礼制与唐代社会的关系,是难得一见的唐代礼制专论。为了照顾内容的完整性,两书都对隋唐军礼进行了一定研究,但可惜都未将其作为研究的重点。陈戍国《隋唐五代卷》只是把一些有关隋唐军礼资料堆砌在一起,略做评论,浅尝即止。任爽的《唐代礼制研究》中军礼部分更是着墨甚少,基本只是罗列各类军礼名目,再加简单解释介绍而已。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礼制研究更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对唐礼的研究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总体说来,对隋唐吉礼、凶礼和嘉礼的研究硕果累累,所涉及具体仪式的种类之多,是其他时代礼制研究无法比拟的,但对军礼和宾礼的研究则受困于史料缺乏,重要成果较少。

事实上,近年来,随着军事热的出现,关注古代军礼及其相关内容的学者也日益增多。如张云胜《古代军队礼仪的文化内蕴与教化功能》^①是一篇专门探讨古代军队礼仪教化功能的文章,其文首次将古代军礼与现代军队建设联系起来,明确提出要从古代军礼中汲取营养,陶冶现实军人的高尚情操,帮助养成明尊卑,严纪律的优良作风。但该文对仪式本身缺乏深入介绍和探讨,且所探讨的军队礼仪主要还是先秦礼仪。再如胡新生《西周时期三类不同性质的射礼及其演变》^②、梁满仓《魏晋南北朝军礼鼓吹刍议》^③、梁满仓《魏晋南北朝军法实践及其礼制归属》^④、郭旭东《甲骨卜辞所见的商代献捷献俘礼》^⑤、王瑜《关于中国古代“讲武礼”的几个问题——以唐代为中心》^⑥、王政《战捷献俘馘:〈诗经〉军旅祭典研究之一》^⑦等。他们都将军礼中某一项内容作为自己研究的切入点,有的甚至还超出了传统的“军礼”内涵,开始关注与军礼相关的一些内容,如鼓吹、军法等,进一步拓宽了“军礼”研究的范围。

而在一些礼仪制度专著中,军礼同样是无法回避的内容。如杨志刚的《中国礼仪制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在探讨礼制沿革和历代礼典概况的同时,也用少量篇幅对隋唐军礼进行了概貌性介绍。在军制史研究中,同样会涉及军事礼仪的研究,如徐永的《简明中国军制》、刘展的《中国古代军制史》、袁庭栋《揭秘中国古代军队》等专著

① 张云胜:《古代军队礼仪的文化内蕴与教化功能》,《军事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161-168页。

② 胡新生:《西周时期三类不同性质的射礼及其演变》,《文史哲》2003年第1期,第113-118页。

③ 梁满仓:《魏晋南北朝军礼鼓吹刍议》,《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37-59页。

④ 梁满仓:《魏晋南北朝军法实践及其礼制归属》,《人文杂志》2007年第4期,第162-169页。

⑤ 郭旭东:《甲骨卜辞所见的商代献捷献俘礼》,《史学集刊》2009年第3期,第27-34页。

⑥ 王瑜:《关于中国古代“讲武礼”的几个问题——以唐代为中心》,《求索》2009年第4期,第221-224页。

⑦ 王政:《战捷献俘馘:〈诗经〉军旅祭典研究之一》,《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4期,第138-141页。

都零星地提到了军事礼仪文化的部分内容。此外还有一些大百科类的著作,大多辞条化,缺乏深入梳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目前学界对中国传统军事礼仪文化尚缺乏专门而系统的研究,对于隋唐军事礼仪制度作专题性综合研究更是少之又少。究其原因主要与军礼资料不如吉礼、嘉礼、凶礼等集中充足,导致学者的关注度不够有关。但事实上中国古代军礼是一个庞杂的礼法系统,其中既包括军事行动和准军事行动中的各类礼仪,也包括军事行动中的一些规章制度、纪律法规,其影响范围涵盖军事行动和军队建设的全过程。可以说,从出征、交战到回师,从阅兵、军演到特殊节令都有军礼的身影。尤其是隋唐时期,国力强盛,礼制成熟完备、民风尚武、军事活动频繁,更难能可贵的是其军礼中的神秘色彩已逐渐淡化,而真正具有凝聚军心,振奋士气作用的军礼则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通过梳理和研究这一时期的军礼,我们不仅可以了解隋唐时期军事活动与军队建设的多方面内容,对隋唐军事史、礼制史研究作一个方面的补充,更希望能归纳提炼出有利于当前我军军队建设的合理礼仪形式和精神内核,达到加强管理,提升战斗力的现实目的。因此,笔者以《大唐开元礼》为框架,广泛收集与隋唐军事礼仪,尤其是征伐礼仪有关的资料,扩展其研究范围,撰成此文,以为抛砖之举,以祈方家指正。

引 言

任何时候,战争都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正所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①,为此,孙武提出对战争应慎而又慎,算而后动的主张。但不管人们事先对战争作多少准备、预测,甚至推演,战争往往又是具有极强不可预知性的人类活动之一。因此,围绕着战争,人类创造了很多与征伐有关的礼仪,或包涵着求神祈福的敬意,或迸射出振奋军心的激情,或承担宣布纪律的职能,如此种种,中国也不例外。

《礼记·王制》记,西周时期,“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祫,禡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学,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②唐代杜佑《通典》自注,对此段话中提及的西周战争礼仪做了较为详细的解释:“周制,天子将出征,类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祫。肆师为帝位。(帝谓五德之帝,所祭于南郊者。类、宜、造,皆祭名。孔颖达云:‘天道远,以事类而祭告之也。社主杀戮,故求便宜。社主阴,万物于此断杀,故曰宜。造,至也,谓至父祖之庙也。言祫者,辞时先从卑,不敢留尊者命也。将出者,谓行幸巡狩。’)禡于所征之地。(禡,师祭也,为兵禡也,其礼亡。其神盖蚩尤,或云黄帝,又云:‘若至所征之地祭者,则以黄帝、蚩尤之神,故亦皆得云禡神也。若田狩,但祭蚩尤而已。’)受命于祖,以迁庙主载于齐车^③以行。(告祖以行,示不自专,故言受命。必以迁主行,言必有尊也。)无迁主,以币帛皮珪告于祖祫,遂奉以出,载于齐车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以脯醢礼神,乃敢即安也。所告不以出,即埋之。若有迁主,则载迁主而行,此币帛遂埋于阶间。)反必告,设奠,卒,敛币玉,藏诸两阶之间,乃出,盖贵命也。受成于学。(定兵谋也。)过大山川,则用事焉。(用事,令太祝用祭事告之。‘凡告必用牲币,反亦如之’。‘牲’当为‘制’。)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释菜奠币,礼先师也。讯馘,所生获断耳者。)诸侯将出征,宜社造祫及无迁主以主命,并如天子之制。”^④

从杜佑的记载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到按照周礼,周天子亲征之前除了要主持三场重要的祭祀——祭天、祭社、祭祖先外,还要主持太学议兵,定兵谋的仪式。大军开拔之前,为

① (东周)孙武:《孙子兵法·始计第一》,引自《中国兵书集成》(第1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沈阳:辽沈书社,1990年,第1页。

②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12《王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71页。

③ 斋戒时所用之车。《周礼·夏官·齐右》:“掌祭祀会同宾客前齐车。”郑玄注:“齐车,金路。王自整齐之车也。”孙诒让正义:“《叙官·齐仆》注云:‘古者王将朝覲会同必齐。’是齐车以齐戒为名。”《礼记·曾子问》:“天子巡守,以迁庙主行,载于齐车,言必有尊也。”《通志》等作“斋车”,其义相同。

④ (唐)杜佑:《通典》卷76《军礼一》,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061-2062页。

了“示不自专”、“言必有尊”，还要将太庙庙主（象征祖宗的牌位）请出，载于齐车中，随同大军一道开拔，称为祖，或行主。比如据《史记·周本纪》记载：“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①另据《周礼·春官·小宗伯》记载：“小宗伯之职，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若大师，则帅有司而立军社，奉主车。”^②可知，周代大军开拔前，除迁庙外，还需把太社社主一并迁出，置于另一辆齐车中，作为随军的军社。在行军途中，每行军一宿或三十里就要祭告行主和军社一次。大军过大山川，也要由太祝祭告之。到达战地后，行“禘祭”，祭祀的对象是远古的战神——黄帝或蚩尤。因为征伐是“受命于祖”，所以回师后应祭告祖先。由于“受成于学”，所以回师后要呈俘虏和敌人断耳于学里，以祭祀先圣先师。与天子亲征相比，诸侯出征除无“类于上帝”之仪外，其余一如天子之制。可知，当时一场战争中涉及祭祀的礼仪相当多，几乎贯穿了战争的全过程。除了数量众多的祭祀礼仪外，文中还提到了献俘礼，那么这些古礼到隋唐是否得到了完整保留呢？

由于隋唐礼制与北朝礼制渊源颇深，所以在讨论隋唐军礼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北齐的做法。据《隋书》记载：

“后齐天子亲征，纂严，则服通天冠，文物充庭。有司奏更衣，乃入，冠武弁，弁左貂附蝉以出。誓讫，择日备法驾，乘木辂，以造于庙。载迁庙主于斋车，以俟行。次宜于社，有司以毛血衅军鼓，载帝社石主于车，以俟行。次择日陈六军，备大驾，类于上帝。次择日祈后土、神州、岳镇、海渚、源川等。乃为坎盟，督将列牲于坎南，北首。有司坎前读盟文，割牲耳，承血。皇帝受牲耳，遍授大将，乃置于坎。又歃血，歃遍，又以置坎。礼毕，埋牲及盟书。又卜日，建牙旗于埤，祭以太牢^③，及所过名山大川，使有司致祭。将届战所，卜刚日，备玄牲，列军容，设柴于辰地，为埤而禘祭。大司马奠矢，有司奠毛血，乐奏《大护》之音。礼毕，彻牲，柴燎。战前一日，皇帝祷祖，司空祷社。战胜则各报以太牢。又以太牢赏用命战士于祖，引功臣入旌门^④，即神庭而授版焉。又罚不用命于社，即神庭行戮讫，振旅而还。格庙诣社讫，择日行饮至礼，文物充庭。有司执简，纪年号月朔，陈六师凯入格庙之事，饮至策勋之美，因述其功，不替赏典焉。”^⑤

这一段文字较为完备地记载了北齐天子亲征时的相关军礼，从中我们大致可以整理出北齐皇帝亲征时所行军礼的一个完整过程：

（1）出征前，天子主持的一系列祭祀礼仪是从“纂严”开始的。所谓“纂严”即军队严装、戒备，类似于今天的戒严。可惜的是《隋书》只记载了此仪皇帝的着装，对仪礼本身并未做详细描述。在这个仪式上，天子主要是换好戎装后出来发表誓词。

①（汉）司马迁：《史记》卷4《周本纪第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0页。

②（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卷1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87页。

③据《大戴礼记·第五十八·曾子天圆》记：“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馈食。”

④据《周礼·天官·掌舍》：“为帷宫，设旌门。”贾公彦疏：“食息之时，则张帷为宫，树立旌旗以表门。”可知古代帝王出行，张帷幕为行宫，宫前树旌旗为门，此门称旌门，故据此推断，此礼是在战地即时举行的。

⑤（唐）魏征等：《隋书》卷8《礼仪三》，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10页。

(2) 选择吉日,天子备法驾^①,乘木辂^②,到太庙和太社祭告。其仪为先告庙,将宗庙里的牌位,即庙主请出,置于斋车之中。随后告社,同时举行衅军鼓的仪式,再将太社里的石主请出,同样置于斋车中,完成“建军社”之礼,准备随同大军一道出发。

(3) 又择日类于上帝,这个祭祀的规格最高,六军俱陈,皇帝也备最高规格的卤簿——大驾。

(4) 其后再择日“祈后土、神州、岳镇、海渚、源川等”。由于后土等诸神属阴,所以要掘坎(地穴)以祭。在这个仪式上,有司按礼宣读讨伐檄文,取牺牲血,与诸将歃血为盟,礼毕,将牺牲和盟书并埋于坎下,以祭地神。在北齐完整的战争礼仪流程中,《隋书》的作者突出了对此礼细节的描写,究其原因,可能与此礼表面上是向后土诸神表达敬意,但实际上却是一个诸将对皇帝宣誓效忠的仪式有关。

(5) 再占卜择日,于郊外大军驻扎之地平整一块场地,建牙旗,并以牛、羊、豕三牲齐备的祭品规格行祭牙旗之礼,此后,大军才真正出发。

(6) 大军所过之处,凡遇名山大川,皇帝均要派专人前往致祭,以求得山神、河神对大军行进的庇佑。

(7) 在即将到达战场之前,皇帝的大军就地驻扎下来,也就是说,在距离战场有一定距离的地方设置大本营,开辟临时指挥所。这时皇帝要主持一次非常重要的祭祀——禘祭。此次祭祀,按例是要通过占卜,选择“十干”记日法中的甲日、丙日、戊日、庚日或壬日的一日作为祭祀之日。这五日相当于今天的单日,古人认为这五日居奇位,属阳刚,故有利于军事。选好日子,平整好场地后,皇帝率领大军齐集,做最后战前动员。此仪要准备黑色的牛羊作为祭品,在东南偏东的辰位设置柴堆。辰是地支的第五位,属龙,故将此方位作为最后焚烧祭品的地方。礼仪正式开始后,鼓乐奏《大护》之音,由大司马等相关人员奉上弓矢和牺牲的毛血致祭。仪式结束后,把供品放在柴堆上烧掉。但可惜的是此处并未说明禘祭的对象是谁。

(8) 战前一日,由皇帝和司空分别向随军的祖宗牌位(称为祖或行主)和太社石主(即军社)祈祷。

(9) 一旦获胜,皇帝要用太牢礼向行主和军社行报祭之礼。在祭行主的同时还要用太牢礼的规格对有功将士论功行赏,祭军社时则行罚过杀罪之仪。据《尚书·甘誓》记载,夏王启出征有扈氏时,在誓师辞中告诫将士:“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可见,此仪同样是遵循先秦军礼而设。值得一提的是,此礼与献俘礼并不是一回事,其一,此礼是在战后即时举行,而献俘礼是在大军班师回朝后举行;其二,周代献俘的地点是太学,而此礼所行地点为战地临时设置的军社、旌门等。

(10) 回师后,首先要把当初请出随军的祖宗牌位和太社石主分别送回太庙和太社,同时把战胜的消息告庙、告社。此后择日行饮至礼,同时命人记录告庙、饮至的盛况,并作诗文歌颂其功绩。

对比这两段史料,我们不难看出北齐军礼是在基本保持周礼框架的基础上,增加了

① 天子车驾的一种。中国古代帝王出外时扈从的仪仗队分大驾、法驾、小驾三种规格。

② 即“木路”,古代帝王所乘的一种车,天子五路(玉辂、金辂、象辂、革辂和木辂)之一,只涂黑漆而不覆以革。

“纂严”环节^①，减少了“受成于学”和献俘于学的环节，甚至根本没有提到献俘礼。《隋书》的编撰工作由唐初名臣魏征负责，参加编修的还有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人，均为一时名儒，也是唐初儒学复兴，礼仪修订的干将，所以不可能出现漏记，只可能是当时的确未行献俘礼，或者是献俘礼与战后赏罚礼仪已合二为一了。“其后，号称‘宪章姬周’的北周，又恢复了‘献俘于太庙’的制度。至此，与征伐有关的古代军礼在形式上基本得到复原，并载入国家礼典，为后世遵用，直至清朝覆亡。”^②此外，《隋书》的作者在记载上还弱化了战前的祭天、祭社等传统军礼的内容，突出了“祈后土、神州、岳镇、海渚、源川等”、禘祭和战后赏罚等礼仪的细节，可见其军礼中的神秘色彩已逐渐淡化，而真正具有凝聚军心、振奋士气作用的军礼则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一变化趋势后来在隋唐军礼，尤其是唐代军礼中得到充分表现。

从以上两段史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围绕一场军事征伐涉及的军礼是比较多的，为了更好地研究这些军礼，笔者根据战争的过程将与征伐有关的军礼分为出师前礼仪、出征礼仪、征战礼仪、凯旋庆功礼仪、丧葬吊恤礼仪等五大部分，逐一分析整理，以尽最大可能恢复隋唐军礼中事关征伐礼仪的面貌。

^① 陈成国《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认为“军事戒严之仪决非南北朝时期始创，应该是上古即已有之。”但见之文献者，则是从《晋书》开始，南北朝时逐渐增多。如《晋书》卷二十五：袴褶之制，未详所起。……又有纂严戎服而不缀标行留，文武悉同……”。另据《佩文韵府》卷二十九之一“纂严”一词记：“纂严：《南史·宋顺帝纪》：荆州刺史沈攸之举兵不从执政萧道成入守朝堂，侍中萧巖镇东府，中外纂严。《唐书·礼乐志》：皇帝亲征纂严，其日上水五刻，侍中版奏，请中严级载近仗列于庭。”故笔者认为不依文献记载，而依人情事理设想，就得出上古军礼中即有“纂严”一礼，似乎不能成立。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此环节在上古可能存在，但先秦军礼重在祭祀礼仪，故并未将此作为军礼的一个内容。

^② 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25-426页。